

##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 脑子里要有个『紧箍咒』

□张勇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温水煮青蛙，前车之鉴不可忘却，每个人还是要好好复习一下。脑子里要有个‘紧箍咒’。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没有敬畏感就会迷了道”。

“紧箍咒”一词出自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原意是指唐僧用来制服孙悟空的咒语，后指约束人的制度、规矩等。孙悟空靠“紧箍咒”的束缚收敛顽性、约束劣性，融入取经队伍，最终取得真经、修成正果。习近平总书记用“紧箍咒”比喻党的纪律规矩，旨在警示党员、干部对纪律要常怀敬畏之心，时刻保持“吾日三省吾身”的清醒，真正把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交出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紧箍咒”之于孙悟空犹如纪律规矩之于党员、干部。“紧箍咒”是通过收紧孙悟空头上的金箍发挥其约束作用，党的纪律规矩同样是对党员、干部的硬约束。毛泽东指出，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

两者都不可少。他强调，“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对于一个党员、干部，纪律是高压线；对于一个政党，纪律是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硬起手腕抓纪律建设，充分发挥了纪律规矩的刚性约束作用，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

“纪律是块铁，谁碰谁流血。”任何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职务高低，都必须严守党的纪律，既不能因为是普通党员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更不能因为位高权重而无视纪律约束。党员、干部要遵规守纪，这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的，就像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不是想戴就戴、想摘就摘的，戴上了就要接受“紧箍咒”的约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前车之鉴不可忘却”，从近年来查处的违纪案件来看，党员、干部只要违反了纪律，不管伪装有多好，也难逃群众的监督，难逃纪律的严厉惩戒。我们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纪律约束没有例外，不因事小而姑息，不因权大而破例，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既让铁纪“长牙”、发威，又让党员、干部重视、警醒、知止。

“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欲事立，须是心立；打最硬的铁，须是铁打的人。党的纪律是统一的纪律、铁的纪律，是带有强制性的，但又必须建立在党员、干部的自觉性上。在取经路上，孙悟空对“紧箍咒”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从反抗到接受的过程，最后把戒律内化到自己心中，心甘情愿护着师父完成了取经大业。我们党历来强调要培养“自觉的纪律”。毛泽东多次讲过“锦州苹果”的故事。他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尽管解放军战士劳累饥渴，但是都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纪律发自内心的敬畏和遵从。事成于慎而败于忽，时常念念脑子里的“紧箍咒”，不断拧紧遵规守纪的发条，就能防微杜渐、慎始慎终。从这个意义上讲，纪律规矩就是党员、干部的“护身符”，因此，要真正把铁的纪律刻在心上、印在脑子里，成为心灵深处的“压舱石”。

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党的纪律建设永远在路上。党员、干部要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真念常念“紧箍咒”，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敬畏党、敬畏人民、敬畏法纪，切实把党章党规的他律要求转化为内在追求和行为准则，在修身正己中担当作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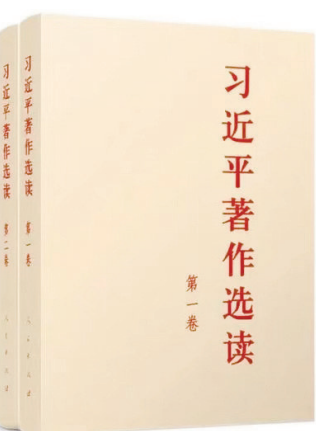
#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 ——读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郑琦 陈小冰

### 习近平著作选读

## 重读经典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2013年12月至2017年10月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重要论述的节录，收录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这篇重要文献深刻阐述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重要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路径等重大问题，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规律性认识，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

### 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在前进道路上全党必须牢牢把握的首要原则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鸦片战争以后，无数仁人志士为挽救国家危亡，设计过各种政治主张，成立过

许多政党，然而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什么时候坚持了党的全面领导，党和人民事业就健康发展；什么时候弱化甚至放弃党的全面领导，党和人民事业就受到挫折甚至失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锚定目标、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与改革开放之初不同，当今的中国社会结构更加多元、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再加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排除各种干扰、剔除各种杂音，让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就无法做到古人讲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因此，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

###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始终高度重视党的领导权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从来都是旗帜鲜明，尤其是开创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这四个“最”鲜明地揭示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党的领导政治属性、实现原则的认识，把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与党的领导紧密联系在一起，加深了全党对这个问题的科学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施好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必须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 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指明方向

这篇重要文献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党的领导权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首先，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具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

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章规定‘四个服从’，最根本的是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党中央强调‘四个意识’，最根本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三个“最根本”深刻揭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

其次，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既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我们党的领导制度。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高度重视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同时，进一步完善各项配套制度，例如：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完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等等。

再次，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各子系统既要各负其责又要相互配合，整个系统的核心则是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一作用形象地比喻为“众星捧月”，强调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切实做到总揽不包揽、协调不越位，推动各领域各单位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

最后，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自主探索的适合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从哪里克隆来的，也不是亦步亦趋效仿别人的。因此，在坚持党的领导上，我们必须理直气壮、旗帜鲜明，不断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



余嘉锡（1884—1956年），字季豫，号翁翁，湖南常德人，文献学家、目录学家、文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余嘉锡一生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勤于著述。他治学实事求是，不主观臆断，更不先入为主，多闻阙疑，继承乾嘉文献考据学的传统，博考详究，下笔不苟，坚持“虚其心以察之，平其情以出之”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

### 博览群籍，“穷日夜读之不厌”

余嘉锡倡导治学首先要勤奋不倦，读书要广博，“读书未博，故立言不能无失”。他曾在《黄颢遗书·序》中称赞清代著名校勘学家、目录学家顾广圻：“（顾）千里读书极博，凡经史小学、天算舆地、九流百家、诗文词曲之学，无所不通。于古今制度沿革、名物变迁，以及著述体例，文章利病，莫不心知其意。故能穷其旨要，观其汇通。”

余嘉锡自幼嗜学，读书用功颇勤，且博闻强记。他从小接受家教，其父余嵩庆，曾进士及第，深通经史，亲自为他启蒙授课。受父亲教诲，他勤奋不辍，阅读了大量文史典籍，自称“嘉锡颇知嗜学，发廛中书

尽读之”“遂斐然有述作之志”。十四岁时，作《孔子弟子年表》，读《郁离子》，效其体著书数万言。十六岁时，为《吴越春秋》作注。十七岁时，购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则大喜，穷日夜读之不厌”。李国良在《怀恩师余季豫先生》中回忆说：“先生博学多闻，涉猎至为广泛，常谓‘读书五千册以上’，较之南皮张氏《书目答问》所列诸书，远超过之。”

余嘉锡还主张读书需要反复读，据周祖谟、余淑宜撰写的《余嘉锡先生传略》所载，“先生终日手不释卷，一部书要读好多遍”，认为“四部书，熟悉千余种，皆知其高下浅深”。余嘉锡曾引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颜之推所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引用《魏志·王朗传注》中董遇所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并指出，虽然很难达到观遍天下书，也很难达到书读百遍，但是“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

### “先致力乎根柢，循序渐进，不凌节而施”

余嘉锡认为，做学问要致力其根本，治之有序、择之有道。正如他在《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序》中说：“盖君之读书，先致力乎根柢，循序渐

进，不凌节而施。”

治学需讲究根本和次序，不能不求根柢，但求其枝叶。余嘉锡说，“凡学有端、有委、有正、有诡、有中庸、有偏倚，其治之也有序，其择之也有道，故曰：‘操其本，万物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盖未有不致力乎本，而能成其学问者也”，指出做学问不能好高骛远，不能超越次第，应循序渐进。

他强调读书要多读“已见书”，反对那些对普通常见书都不读不知，却去舍本逐末，追求无根之学的做法。余嘉锡批评那些猎奇“未见书”者：“书尚未见，何以读之！”他命名自己的书房为“读已见书斋”，其中收藏了经史子集四部中的各种经典，而且许多都是精选的刻本。

### “目录之书为用最广，为学至切”

余嘉锡终生所从事的学问，以目录学为主。他在著作《目录学发微》中强调，“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不可不涉其藩篱”。他力倡目录学，提出“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

晚清张之洞为了给诸生好学者指

明“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撰写了《书目答问》《轺轩语》两编。十六岁的余嘉锡在阅读《书目答问》时，“骇其浩博”，又读《轺轩语》，则略知学问门径。张之洞指出：“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余嘉锡说：“张氏之语虽若浅近，然实深知甘苦之言。必明此义，而后知目录之书为用最广，为学至切。”他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作，前所未有的，足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

余嘉锡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肯定并发扬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进一步提出了“目录者学术之史”的观点。他在目录学教学讲义的基础上著成的《目录学发微》，引用了大量古籍资料，对目录学的意义、功用、源流、目录类别沿革等予以总结，对目录的篇目、叙录、小序、版本、序跋等体例阐述颇详，对研究古典文献提供了指导，对我国目录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 “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耳”

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余嘉锡主张做学问要实事求是，不能

盲目信从，要多静心思考，明辨是非，不墨守成规，不持门户成见。

学问是无穷的，而人的认知是有限的，即使是圣人也会犯错，因此在读书和治学时不能盲信盲从。余嘉锡说：“学问之关涉无穷，而一人之精神有限，有所通则有所蔽，详于此或忽于彼，稍形率尔，疏漏随之”，因此，读前人之书要多思考，应做到“虽眼前经史，亦必覆检原书，审其是否。又当知其所引据之外，尚有他书。如折狱然，必具两造，甲以为如此者，安知乙之言不如彼，比而证之，而后曲直乃见”，这就是所谓“实事求是”。如学子不明此义，懒于考索，以耳代目，总认为“某先生之言，安得有误”，贸然援用，且从而推演之，则必为有识之士所耻笑。

治学还要做到多闻阙疑。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中指出：“善读书者，亦惟慎思明辨，好古敏求，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耳。”更强调了读书要时刻持有怀疑精神。

### 必博考详究，“权衡审慎，而后笔之于书”

博考详究，慎思明辨，下笔不苟，是余嘉锡一直躬身践行的理念。他在《目录学发微》中说：“欲论古人

之得失，则必穷究其治学之方，而又虚其心以察之，平其情以出之。”认为治学不能主观臆断，更不能先入为主，应平心思考，坚持实事求是。在《四库提要辨证·序》中，他写道：“余治此有年，每读一书，未尝不小心以玩其辞意，平情以察其是非，至于搜集证据，推勘事实，虽细如牛毛，密若秋荼，所不敢忽，必权衡审慎，而后笔之于书。”可见其审慎的治学态度。

余嘉锡在《藏园群书题记·序》中称赞傅增湘治学求真求实：“平生所校书，于旧本不轻改，亦不曲徇，务求得古人之真面目。”而在《读已见书斋随笔》第二十八篇《洪亮吉之地理学》中，则严厉批评洪亮吉之“率尔操觚”：“夫考古之难，患在无书；若有书而不知用，不如不考……纵令急于成书，亦当明著其未见，以示阙疑。乃讳莫如深，岂不贻误后学？”

余嘉锡承袭乾嘉考据学的求实传统，他的著作多考证而少议论。《四库提要辨证》一书，他耗时五十余年，凡于事实有疑误处，则进行大量考据，旁征博引，穷源竟委，详加订正，找到可靠的根据，才下结论，决不做臆断猜测。对投入二十年精力完成的《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说：“一生所著甚多，于此最为劳瘁。”他参稽群书，在《世说新语笺疏》中所引证的书籍有数百种之多。可见他的考证注重博考详究，做到了“揆之于本书而协，验之于群籍而通”。这种对待学问的严谨态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启示。

